

英汉对比在 英语翻译教学 中的运用研究

郭敏 著

English

辽海出版社

英汉对比在英语 翻译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郭 敏 ©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汉对比在英语翻译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 郭敏著

--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51-5004-9

I . ①英… II . ①郭… III . ①英语 - 翻译 - 对比研究 - 汉语

IV . ①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0554 号

责任编辑: 丁 凡 高东妮

责任校对: 丁 雁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海出版社出版发行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辽海出版社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市天河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1/16 印张: 12 字数: 215 千字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前 言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深英汉对比对英语翻译教学的分析研究,并且发现了采用英汉对比的方式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翻译虽为个体所承作,却是一种社会活动,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就前者而言,翻译经过千百年来各国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已经在语言学、文学、文化、心理学、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并在具体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跨文化和语言转换模式。随着科学的日益进步,这种体系和模式正处在不断地完善之中。就后者而言,翻译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翻译理论产生于翻译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实践转过来又丰富翻译理论。可以说,没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翻译理论的产生;没有翻译理论作为指导,翻译实践就会难免走弯路。因此,学好翻译既要重视翻译理论的学习,又要加强翻译实践;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学好翻译的必由之路

具体来说,本书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翻译的理论研究,简要阐述了翻译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的翻译理论,同时对翻译的流派发展做了阐述,并就译者的素质与翻译准备工作进行详细阐述;第二章从宏观、微观等多个方面对英汉词汇对比问题与翻译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对翻译中词语冗余、成语翻译、语序排列、语篇分析等方面用很多的语言素材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第四章对英汉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分析做了深入阐释;第五章通过对国内外英汉隐喻的主要理论以及工作机制的深入研究,探索和揭示了英汉两种语言在隐喻表达形式上存在的跨文化间的共性与差异,探讨了英汉隐喻中的文化认知和跨文化视角,以便英语翻译时能够更好地把握不同语言在形式与意义表达上的基本规律;第六章诠释了英汉翻译中的文化重构,分析了文化、语言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对中西分化差异做了比较分析,并且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传递及文学翻译中文化缺省补偿策略做了深入阐释。整本书内容丰富全面、结构完整、逻辑清晰,语言精简,方便读者全面深入地学习。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仁、专家和朋友的关心与支持,同时也参考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果和专业书籍等资料,在此一并向有关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行批评指正。

作者

2018年1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英语翻译相关理论研究.....	001
第一节 翻译的内涵诠释.....	001
第二节 翻译学发展及取向流派之争.....	006
第三节 翻译学在中国.....	009
第四节 译者的素质与准备工作.....	011
第二章 英汉词汇对比与翻译.....	018
第一节 英汉词汇的微观对比与翻译.....	018
第二节 英汉词汇的宏观对比与翻译.....	031
第三章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040
第一节 翻译中词语的冗余现象分析与翻译策略.....	040
第二节 成语的优化翻译.....	044
第三节 翻译中语序比较研究.....	049
第四节 翻译中的语篇分析与调整.....	051
第四章 英汉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分析与翻译.....	059
第一节 英汉同位语顺序差异及翻译.....	059
第二节 英汉语句子的综合和分析.....	060
第三节 英汉思维差异与翻译中的正反表达转换.....	061

第五章 英汉隐喻的历时对比研究与隐喻翻译	063
第一节 隐喻的界定及主要发展理论	063
第二节 英汉隐喻的共性与差异性	085
第三节 隐喻视角下的翻译决策与分析	114
第六章 英汉文化比较与翻译实践	129
第一节 文化、语言与翻译	129
第二节 中西文化差异比较分析	149
第三节 英语翻译中的文化缺省补偿策略	154
第四节 英语文化翻译实践	169
参考文献	184

第一章 | 英语翻译相关理论研究

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源远流长。早在东汉时期由佛经翻译引起的文、质两派的争论中，我国的译论研究便初露端倪。此后东晋的道安，南北朝的鸠摩罗什，唐代的玄奘，清末的马建忠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翻译有过论述。

第一节 翻译的内涵诠释

一、翻译的界定

(一) 翻译的涵义

从广义的角度看，翻译是指两种语言之间还有语言和非语言之间的基本信息的以及代码装换。例如：英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转换，语言和福声音、体势语的之间的相互转换。

从狭义的角度看，翻译是以克服语言障碍，和转变语言的形式，来实现意思交流的一种语言手段。是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相互的活动。我们把一种语言所要表达的内容，用另外一种语言的形式给表达出来，是一种形式上的装换，是意义的传递。

从“翻译”的定义来看，翻译即为言语的转换，使读者能够理解。《新华宁典》解释为：用一种语文的内容形式依照原来的意义改变成另一种语文的形式；《现代汉语词典》解为：通过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来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并将其意义表达出来。翻译所要表达的基本涵义有两个：一是翻译是以忠实于原作的意义目的来进行的活动，二是翻译的两种语言之间相互转换的活动。

此外，国内还有范仲英教授“翻译是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使通晓不同语言的人能通过原文的重新表达而进行思想交流；是把一种语言（即原语）

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的定义；国外还有费道罗夫的“用一种语言手段忠实、全面地表达另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说，奈达的“在接受语寻找原语信息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话语”说等等。所有这些，都道出了翻译的本质，即：忠实地传达原义。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它还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有意义。所以把翻译当成一个过滤装置，一经翻译只存意义，滤出语言形式（表达手段）的作法往往会使我们失去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极度的归化译法会抹去许多风格、艺术、文化的特征，从而影响译文的真正价值。

（二）翻译的通用标准

关于翻译的标准，确实可谓众说纷坛。其中国内译界流传、遵循最广的翻译标准至今仍应该是清末翻降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字说：

信——承用原作内容，取信于读者；

达——译文酣畅地道，为译文读者喜闻乐见；

雅——强调译语包装，增强译文的可读性。

按鲁迅先生所说，翻译，就是“给洋鬼子化个妆”，但是“不必剃眼、割鼻”。即是说，翻译只是相当于为外国人融入本国做化妆、变装、换口音甚至教语言的工作。而不论他外表变得多厉害，人总还是原来那个完整的外国人，只是能够融入中国社会，可以与中国人沟通、共鸣了。这实际就从本质上肯定了翻译的第一要义——忠实。细思之，则也还有“达”、“雅”的意思蕴含在内。此论，是笔者比较认可、推崇的简要精当而形象贴切的翻译标准。

（三）翻译审美的原则

关于翻译的原则也有很多论述，笔者这里只想强调两条：一是必须确立翻译审美标准的相对性。不能简单地把一种语系之间的转换规律说成是另外一种语系之间的转换规律。由于，语系转换规律具有相对适应性，因此，审美标准也就要具有相对性。比如同一语系之间的双语转换可以容许有较多的模拟式形式美，不同语系间的则应努力探求对应式或重建式的形式美。这点是针对当下理论界的“唯洋派”而说的。

二是必须确立翻译审美标准的依附性。翻译不是创作，不能不顾原文，一味臆造。译者必须选择与原文审美构成相适应的审美再现手段。这点是针对当下理论界的“译者主体性”“译作自创论”而说的。

（四）翻译审美的方法

一是模拟，即按照原文的语言形式美和文章气质美模仿复制译文。

二是对应，要求译者善于捕捉原文模糊性审美构成，还必须对目的语具有较强的审美意识，能在目的语中找到与原文的美相对应的表达方式。

三是重建，是高层次的审美再现手段，前提是审美生体必须充分发自己的审美功能，完全进入化境，才能对原文美重新加以塑造。

二、翻译行为的性质

（一）翻译的创造性

翻译与文学创作最大的区别在于：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个原文或原作。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翻译就是对原作的临摹或模仿（imitation），那么所谓翻译的“创造性”（creativity）又从何谈起呢？从公元前4世纪直到20世纪90年代，两千多年来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常常在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关于翻译的模仿性，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论述：

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Alexander F. Tytler）：“好的翻译要求原作的长处完全移注在另一种语文里，使得译作文字所属的国家的人能明白地领悟，强烈地感受，正像用原作的语文的人们所领悟的、所感受的一样。”（《论翻译的原则》*Essay on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1790）

清末学者马建忠：“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拟设书院议》1894）

著名翻译家傅雷：“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高老头·重译本序》1951）

翻译的模仿说是以原作为中心的，翻译家的任务就是在译入语中摹写原作，其最高标准就是忠实于原作。这样，翻译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衍生的、次要的。因此，翻译史上存在着大量轻视或贬低翻译的比喻，如将翻译视为“驿马”（普希金），“媒婆”（歌德），“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elles，梅纳日）等。然而，在中西翻译史上，将翻译视为创作的翻译家和理论家也不胜枚举，例如，古罗马修辞学家西塞罗就明确提出翻译是一种创作，不仅要与原作相媲美，而且要尽可能在表达的艺术性方面超过原作。因此，在他看来，翻译的主要目的不是“诠释”或“模仿”，而是与原文竞争。西塞罗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与西塞罗同时代的昆体良也认为，“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雄辩术原理》）这种挣脱甚至超越原作的创造说在现当代译论中也不乏拥趸：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写道：“翻译与其说是出自原作之生命，不如说是出自其生命之延续。”“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语言中，把纯语言从另一种语言的魔咒中释放出来：就是通过自己的再创造，将囚禁在作品中的语言解放出来。”

郭沫若认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原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难。”（《谈翻译工作》1954）

诗歌翻译家许渊冲提出：“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內容。翻译的低标准是求似或求真，高标准是求美。译者应尽可能发挥译语优势，……创造性的翻译应该等于原作者用译语的创作。”

翻译的创作说将注意力转移到译作和译入语上，不再以忠实于原文为唯一标准，而更强调发挥译入语的优势，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创作说提高了译者的地位，提升了译作的价值。译作可以超过原文，甚至赋予原文“来世”生命。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说并未否定原作或原文的存在：“译者的审美与创造活动是有原作作为依托的，译者发挥创造的艺术空间是有限的。翻译在审美创造上的局限性，也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因此，翻译中的创造是一种有局限的创造。正如英国诗人德莱顿所比喻的那样，翻译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二）翻译的艺术

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翻译理论看来，翻译的问题就是语言转换的问题。例如，唐代贾公彦在《义疏》中给翻译下的定义是：“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也就是说翻译就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翻译学语言学派，也将翻译视为用一种语言形式代替另一种语言形式，或将一种语言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对等”(equivalence)。例如以下定义：

巴尔胡达罗夫(Barkhudarov 1954)对翻译的定义是：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话语)在保持内容，即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外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

卡特福德(J. C. Catford 1965)认为：翻译是将用一种语言(即源语)写成的文本材料替换成用另一种语言(即译入语)写成的对等的文本材料。

奈达(E.A. Nida 1969)对翻译的定义广为人知：翻译就是在接受语中复制与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等值物，首先是就意义而言，其次是就文体而言。

纽马克(Peter Newmark 1982)认为，翻译是一种技巧，它试图把用一种语言写

成的书面信息和 / 或陈述替换为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相同的信息和 / 或陈述。

在这种观念下, (文学) 翻译就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技巧。译者只要熟练掌握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表达, 用对等的语言符号替换原作的符号即可。因此, 传统翻译学通常轻视翻译理论的价值, 重视具体的字词句转换技巧。语言学翻译理论则热衷于制定语言转换的各种规则。翻译与创作相比, 地位极其低下。翻译家往往被贬低为“翻译匠”。尽管传统翻译学有时也把翻译称作“艺术”, 但翻译的艺术与原创性的文学艺术有着很大区别。在此, 翻译的“艺术”是广义的艺术, 即“一种高超的技能”。

无可否认, 语言转换是翻译不可避免的一个层面, 但这是否就是翻译的唯一层面呢? 当然不是。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当代翻译学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 (文学) 翻译的认识: 首先, 从语言本质上讲, 翻译是一种有想象力, 审美和高度创造性的文学语言。文学语言的创造力和复杂性决定了翻译不能实现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和绝对“等价”, 也不能具有绝对或完全的对等性。其次, 翻译必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发生, 文化体系的结构, 意识形态和诗学决定了翻译是一种“重写”。第三, 翻译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认为翻译是一种“诠释”, 而译者的主体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原作的理解与翻译。因此, 翻译作品必须与原始作品有关, 而无关于原作的“来世”生命。

这些特点决定了翻译绝非“技巧”二字所能概括。那么, 如果我们使用狭义的概念, 翻译是一门艺术吗? 狭义的艺术是指一种“有意识的创造性活动”, 它用想象的、直觉的、感性的、审美的、形象的方式反映现实。我们通常认为是艺术的活动包括: 音乐、舞蹈、美术、文学 (语言艺术) 等。这些艺术活动的要素是创造性、审美性和直接反映现实 (原创性)。显而易见, 我们可以肯定翻译具有创造性和审美性, 但它与现实的关系是间接的, 中间必然隔着原作, 否则就不成其为翻译了。因此, “翻译虽然与艺术活动有相通之处, 但与艺术活动有相当的差异, 我们只能说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活动。”

第二节 翻译学发展及取向流派之争

翻译实践历史悠久,就我国的翻译实践而言,从唐玄奘主持翻译佛经,到民国初年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至改革开放及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翻译活动从未停歇,并渐走渐急。翻译理论从最初的经验式的、规范式的标准和要求逐渐转向科学的、描绘式的研究。代表观点有严复的“信、雅、达”、傅雷的“神似形似”等。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翻译理论大量引入国内,加上语言学理论的引入,翻译学呈现了明显的语言学或语文学取向。

西方有文献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的西塞罗、贺拉斯等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翻译者都认为翻译是一个实践问题,关注的多是“怎么译”的术的层面上的问题,据此,还有“翻译无学”的说法。彼时,研究者多以自己的实践体会为基础,探讨的问题也多是“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以散文译诗”还是“以诗译诗”?这些都是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行为。

翻译实践促进了翻译学(transology)的发展,翻译逐渐被确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当代的翻译理论建构中,各个理论流派既相互借鉴,推陈出新;又互相争鸣,在批评中不断首行。西方的翻译理论流派众多,较有代表性的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译论,等等。每一个学派都有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

20世纪50年代,传统的语言学派第一个登场,代表人物有尤金·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人,他们超越了经验的层面,从语言学立场出发,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阐释翻译中的词与义的关系,翻译中语言、语用、语法、风格等问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翻译学者们开始关注“为什么这么译?”“为什么译这些国家、这些作家的作品”?这些学者开始质疑语言学派,认为翻译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语言转换,而应该是文化转换;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而非一种转码过程:强调目标语文本的功能,译文要实现的目的应该是首要或最重要的;翻译文本之外的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构成了文本之外的“语言外世界”,它们一起与所翻译的文本构成宏观上的文本。这批学者被认为开启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代表人物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值得记住的一点是,霍尔姆斯提出了翻译学的学名 translation studies,来取代 translatology,并被广泛沿用。70年代出现的阐释学派也算是文化学派的一个分支。阐释学派认为翻译研究是一个描述

性研究 (descriptive research) ; 而不是规范性研究 (prescriptive research) 。

进入 80 年代, 美籍比利时学者乐非弗尔 (Andre Lefevere) 与英国比较文学家、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 (Susuan Bassnett) 一起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 翻译研究在欧洲大陆以及后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种与语言学范式迥然相异的新研究范式——文化研究范式, 翻译学发生了“文化转向”(culturalturn), 广泛借用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功能学派等这些西方学界广为流行的各种主义, 都被应用到翻译研究中, 尝试从不同的视角研究翻译问题, 只是各种理论的影响力不同而已。文化学派开始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活动, 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 从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解释翻译的文化内涵。就语言学派和文化学派比较而言, 文化学派似乎被认为是更深层次的研究层面, “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 或停留在对西方翻译理论的介绍层面, 并未自觉地将翻译研究纳入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是翻译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当人们面对翻译问题单从语言方面难以解释和难以解决时, 当人们从更深入的层面探讨翻译现象时, 结合文化进行研究的呼声就越来越高。翻译的文化取向, 关注所翻译内容的人文关怀、社会引导, 以及译者自身的情境。实际上, 经年的研究和实践, 翻译者也已经不是传统的语言学层面上的“逐字逐句”(word for word), 而是文化层面上的“按照意义的”(sense for sense) 翻译或阐释。进入 21 世纪, 翻译研究也从曾经的语文学派和语言学派, 正在流行的文化学派, 初露头角的社会学转向。但是, 就翻译的文化取向, 也有学者担心“泛文化倾向”, 主张翻译要回归本体。

总的来说, 翻译学的发展: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重作者和原文(语言学派翻译学); 七八十年代, 重读者和译语社会(翻译的文化转向); 九十年代重译者(凡努蒂的“译者显身”和中国学者关于翻译主体性的讨论); 21 世纪重翻译过程(对翻译决策的心理探讨)。

诚然, 理论的发展和建构是任何学科独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就翻译学的理论而言, 它能否帮助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能否对翻译加以解释和预测? 翻译理论是应该指导翻译实践, 还是用来规范翻译实践, 这恐怕是任何理论的建构之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观点的分歧所在。就翻译理论而言, 有些理论是指导性的, 但并非是规范性的,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作用很大, 翻译活动还受到翻译目的、翻译环境的影响。

翻译学的理论取向并不是一个学派取代另一个学派,翻译活动不断向纵深发展,翻译所涉及的面向不断扩大,翻译活动受到的挑战不断加剧,因而翻译不仅仅是一门人文学科,不仅仅涉及语言学和文化,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包涵面更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翻译研究应该采用多学科理论滋养下的跨学科路径,以 blog 为例证的以上分析中,可以折射出翻译实践中理论取向的综合性,以及在受者的评价体系中,或在现实影响中,翻译活动是涉及语言、文化及社会多种因素的复杂过程, blog 作为一个科技术语的翻译尚且如此,涉及人文、政治及意识形态的翻译内容无疑将更为复杂。因此,应该采取“语言、社会、文化三位一体的全透视角”,因为任何一种翻译理论见解或实践方法都有其社会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的含义。

一个学科如果要保持旺盛的活力,就必须不断自我更新方法和理念,以适应变动不安的时代。翻译研究游走于不同的学科之间,翻译者散布于不同学科领域,不管其能否不断走向中心,还是不断扩大边缘,一个几乎可以肯定的结局是:翻译学和翻译实践会不断发生转变,语言学取向、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会交叉重叠。译者和翻译评判者需要更开放的心态,在翻译时尽量综合考虑源语及译入语的特征,择其主要特征,综合社会文化语境,整合应用,以期创造性地完成翻译工作。

翻译研究的视角、取向,或曰流派,是多学科的、多元的:既有传统的语言学视角,也有从语言交往出发的功能学派,还有综合性研究,还有译者研究,翻译实践研究等。即使同是语言学视角的研究,也分为认知、关联、话语、语用、心理等多个理论框架。新兴学科和翻译学相结合,就形成了新的交叉学科。比如翻译生态学。生态学(ecology)最初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翻译生态学”(translatological)以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和机制来探讨当今翻译的大语境,探讨翻译的变迁,翻译的新现象。

翻译学的学科地位的确立和巩固,翻译理论不断发展,不仅传统的翻译研究者继续关注全球化时代的翻译及翻译研究,翻译研究之外的学者也开始格外重视翻译问题。翻译与艺术史,翻译的政治问题,法律翻译,等等,非翻译学科也离不开翻译。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应该采取开放的心态,包容各种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翻译研究并非只是另一门学科的分支或只是一门下属学科(sub-discipline)(如隶属于应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之下),译者和翻译理论家关心的是存在于各门学科、各种语言和各种文化之间的世界。

在翻译实践中,不同的翻译中所采用的策略,所依托的理论会不尽相同。blog 一词在华语区大致有“网络日志”“博客”和“部落格”三种译法,这三种译法都

有各自的拥趸者，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诟病和质疑，对其的评判涉及翻译学的语言学取向、文化取向及社会学取向等多个维度，但在 *bolg* 一词的译文中，似乎单独采取以上的任何取向都不能使译文完美，因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翻译学需要新的标准及新思路，三种取向互相整合，把翻译活动看成一个语言、文化和社会心理诸多要素交相互动的复杂动态过程，更接近翻译实践的实质。由此，译者及其素养也会有相应的要求和标准。

第三节 翻译学在中国

中国的翻译实践源远流长，有着辉煌的历史和卓越的成果。最早的翻译活动能追溯到西汉，最初译的内容和佛教有关，最广为人知的唐代翻译界的巨星是玄奘。尽管此玄奘不完全是《西游记》中的玄奘，但历史记载，他西去印度求经，历经 17 年回国，并带回佛经 657 部，在长安（今西安）主持译场，把佛经由梵文译为汉文，成就了我国古代优秀的翻译大家。明代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学著作，把西方科学观点介绍到中国。在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翻译活动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承载了不同的历史使命。翻译活动，盛世繁荣，颓世亦繁荣。到了清代末期，社会已然沉痾难治了，清王朝风雨飘摇，民族岌岌可危，“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知识界的一根救命稻草，于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西方的文学作品被大量地引入，一直到五四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一个高潮。翻译以原作为参照，模仿原作；译作反过来也会被模仿，形成更多的作品，这为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例。

紧随西方的翻译理论，各个学派开始陆续被介借到中国，开始审视浩杂的翻译现象。翻译最初被认为是雕虫小技，登不上大雅之堂。翻译很长时间并没有发展成为影响深远的学科，中国的翻译理论大多以主观经验、个人体验为主。严复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怕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翻译标准。这和中国儒家思想相切合，如“文无采，其行不远。”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中国的翻译理论大多集中在神似或形似（*similarity in spirit or similarity in form*）、直译或意译（*literal translation or free translation*）、归化与异化等二元对立的讨论中，主要专注的是“术”上的问题。

80 年代后期，奈达（*Nida*）翻译理论被引入中国，中国的翻译界发现终于可以有理论“科学地”解释翻译活动了，该理论所提出的关键的概念如“对等、等值”

(equivalence) 以及“读者的反应”(reader's response) 等在中国风靡一时。同时, Newmark, Mounin, Caffordy 也被介绍到中国。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给中国翻译家提供了科学的依赖, 中国的翻译学开始拥护现代西方语言学和西方语言派的翻译视角, 并成为主流观念。

有没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学者潘文国提出, “我想我们应该换一个思路, 不要在理论上兜圈子, 而应从实践上去看, 这样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中国特色翻译学’首先是个实践问题, 它是由实践提出, 而理论不得不关注, 乃至从无法否认到只能承认的问题”, 从而说明中国特色翻译学在实践上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印欧语系和汉语的区别实在太大。

西方的翻译理论适合中国吗? 反思为什么有两千年历史的中国译学到了 20 世纪会失语? 潘文国认为百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则是“西化”的过程。历史来看, 五四运动、现代学科体系的划分都为西方理论在中国散播做了铺垫, 因而潘文国提倡“回归到中国语境来思考问题。”学术研究的理论从本质上讲是话语权的问题, 中国翻译学者集体沉默和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历史, 和中国社会现实的大量翻译实践的确不相称。

对此, 学者有不同的意见。谢天振认为好的翻译理论, 如同先进的技术、好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 都属于全人类, 应该也能够指导中国的翻译, 不应该给某些理论贴上“东方”或“西方”的标签, 搞非此即彼的对立。¹

从事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的人, 大多是游走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间, 应该具有更为开放的心态和开阔的视野; 兼容并蓄一定会有益于学术的开展。我们要克服的是盲目的西化, 认为西方的理论一定是对的, 其实西方学者也没有标榜自己的理论是万能的, 都有明确的研究视角, 都会有很具体的研究对象的限定。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者往往没有深刻吃透原文, 为了给文章或研究提升“理论高度”, 牵强附会地引用一些理论。比如“得失”对等词是“gain and loss”, 但也可以译为“ups and downs, smiles and tears”。翻译理论有用吗? 也许只不过是空洞的说教和浅层的技术分析罢了。连 Mary Snell 也认为语言研究, 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科学的”、语言学取向的翻译理论, 仍然是一种原子论式的片段理论, 与具体现实的语言相脱节。

翻译是一门科学, 也是一门艺术, 科学为艺术提供了保证, 艺术是科学的完美呈现及升华。朱光潜《诗论》中说: “从心所欲, 不越矩”, 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许渊冲借此说翻译艺术的成熟境界, 也是从心所欲, 但不能超越作者的原意。许渊冲曾经参照对比杨振宁的译文, 来对照科学派的“三似”(形似、意似、神似) 与

1 潘卫民. 全球化语境下的译者素养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艺术派的“三美”（意美、音美、形美）。科学派常用对等的译法，艺术派则常用“等化，浅化，深化”三化法。许渊冲把译诗的标准简洁地说成“知之，好之，乐之”。知之是最低的标准，只有读者看了，大声叫好，并以阅读译文为乐，才是最好的译文。还有 20 世纪初就有对唐诗翻译中的诗体和散文体的翻译标准之争，一般说来，散体译文重真，诗体译文重美，所以散体和诗体之争也可以升华为真与美的矛盾。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sublimation），化境就是不拘泥，追求超越与升华。

实质上，近百年以来，中国对于外来的东西一直怀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感情，我们迫于需要（主动地或被动地）去接受它们，但我们又打心里抵制它们。套用心理学的话，这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对异己客体的排斥过程。正如文化学派从翻译现象之外的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翻译问题；语言格式塔（linguistic Gestalts）认为整体大于其各部分纯粹相加之和，而且对部分的分析不能理解到整体；我们也要从更宏观的背景，比如民族历史、经济发展、社会制度、翻译实践等视角看待不同的翻译主张，保障学术争鸣，促进学术繁荣。

第四节 译者的素质与准备工作

一、译者的素质

翻译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高度复杂的艺术形式，它要求译者准确地理解作为艺术品的原作，并创造出同为艺术品的译作。这项工作对译者的职业道德、语言资质、文学修养、艺术感悟和知识面等方面有极高的要求。正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论翻译书》中所说：“一个成功的翻译者除了学习外语，中文也不能忽视，以艺术为根本：不敏感之心灵，没有温暖的同情，没有适当的欣赏，没有相当大的社会经验，没有全面的知识（即所谓的杂项），潜在的彻底了解原作，就是理解，可能无法深刻理解”因此，译者基本素质的培养是从事翻译必须进行的一项长期的准备工作。

（一）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从事任何职业所必须的基本素质，翻译尤其如此。因为译作通常是给不懂外语的读者阅读的，读者对译作质量的信任完全建立在对译者职业道德信任的基础上。因此，译者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翻译的职业道德包括：对待翻译正确的态度、严谨的作风、坚韧的精神和追求完美的品质。正确的态度，指对待翻译的心态要正确，以追求艺术之美的态度，而不是用急功近利的心态对待翻译。